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0-17

2010年4月2日

高度重視七個基礎性資源可能相對萎縮挑戰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李慎明¹

我國正在編制“十二五”規劃。編制好一個科學、合理的規劃，對於我們抓住國內外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應對國內外世所罕見的挑戰十分重要。

國際國內，國內工作是基礎；經濟政治文化，經濟工作是基礎。正確認識國內經濟形勢，是科學判斷我們所處歷史方位、科學規劃未來的重要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不容置疑的鉅大成就。同時，30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我們一是決不能把新出現的相關情況看得過於嚴重，對前途喪失信心，甚

¹ 本文完稿於2010年1月8日，印《香港傳真》時，作者再做少量修改。

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決不能看不到存在的問題，盲目樂觀，拒絕與時俱進。胡錦濤同志曾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足一些，也千萬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於被動”。

我個人認為，在未來一些年內，我國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新困難中，可持續發展的七個資源可能出現相對匱乏的情況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

第一是土地資源。國土資源部公佈的 2006 年度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報告顯示，我國耕地只佔國土面積的 13%，佔世界總量的 8.4%，人均僅有 1.4 畝左右。但改革開放 30 年來，全國耕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兩億畝左右耕地進入房地產商品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對拉動全國 GDP 的增長，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收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的話，就不可能再有較多的耕地資源進入商品領域，否則就會與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發生根本性矛盾。2007 年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代表政府宣佈要堅決守住 18 億畝耕地紅線，而且這一指標要堅持到 2020 年。截止 2008 年，我國共有耕地為 18.2574 億畝，守住紅線本身的任務相當艱鉅。2007 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只是恢復到 1996 年的水平，但人口卻增加了一個億。2020~2030 年，我國人口可能達到 15~16 億，每年需要糧食 5.6~6 億噸，但若無大的科技進步，每年我們僅能生產五億噸左右，而現在國際上每年商品貿易糧不過是兩億噸。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糧食是比黃金還要珍貴的物品。我國這個有著 13 億人口的大國，其糧食的生產與供應必須立足自力更生。

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資源。截止 2009 年 10 月底，我國城鄉居民存款共有 25 萬多億。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銀行直接貸款，絕大部分已經投貸出，並且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有的項目回收投資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時間。政府對經濟建設的投資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一資源在今後也是明顯減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質資源。過去是肥水快流，個人、集體、國營一起上，對開發資源、推動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奪性開採。今後，糧食、石油、水、礦產等各種戰略性資源都將受到很大制約。我國經濟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長。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6 年，我國 GDP 總量只佔世界 GDP 總量的 5.5%，但消耗的能源佔全世界的 15%，消耗的鋼材佔了 30%，消耗的水泥佔了 54%，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 3~4 倍；我國主要產品單位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五百多倍；我國木材綜合利用率只有 40%，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木材綜合利用率已達 80%。水環境狀況嚴峻。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國六百多個城市有三分之二供水不足，其中六分之一的城市嚴重缺水。很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的 30%。礦產資源短缺。目前，我國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屬礦產外，其他礦產已有三分之二的國有骨幹礦山進入中後期。我國人均能源可採儲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000 年人均石油可採儲量只有 2.6 噸，人均天然氣可採儲量為 1074 立方米，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 11.1% 和 4.3%。2003 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七大石油進口國。現在國內石油資源對需求的保證程度僅在 50% 左右，到 2020 年，可能只有 42%，對外依存度將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 45 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可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僅有 21 種。

第四是環境資源。全國七大水系竟有一半河段存在嚴重污染問題。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嚴重。全國 75% 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截止 2009 年，全國尚有三億左右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前幾年，我國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 68%；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第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 77%。全國 90% 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鹼化的面積達 1.35 億公頃，佔草原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並仍以每年兩百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大氣環境處於嚴重污染水平。在 2003 年監測的 340 個城市中，輕微污染、嚴重污染的分別佔 32% 和 27%。過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後治理，現在不僅不能這樣做，而且對過去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從 1993 年起，淮河水污染治理已經進行了 16 年，各級政府已投入七百多億人民幣，但也僅是維持原來污染的程度，沒有繼續加劇惡化而已。據環保部《2006 年中國環保狀況報告》披露，淮河兩千公里的河段中，78.7% 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的標準，79.7% 的河段不符合魚類用水，32% 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的標準，十年前淮河還生長 60 多種魚類，現在幾乎絕跡。如果現在不抓緊防治，十多年後的長江將是今天的又一個淮河。

第五是國際國內市場資源。我國的 GDP 無非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國際市場，亦即外貿：前些年中國進出口增長幅度每年都達 30% 以上，可以說已充分享受入世好處。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進出口在 2004 年就已超過 1.15 萬億美元，佔 GDP 的比重高達 70%（世界各主要大國一般在 20% 左右），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佔領的已經基本佔領，所以今後中國進出口再繼續高速增長的潛力有限。2008 年 10 月，中國的進出口同比增長 17.6%，但到了 11 月便急速下降 9%，12 月份總值下降

11.1%。2009 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 23.5%，其中出口下降 21.8%；進口下降 25.4%。二是國內市場中基礎設施投資。2007 年投資率仍高達 42% 以上，消費率降至 48%。2009 年上半年，我國的投資又為 33.5%，如果扣除資源價格下降因素，則為 41.2%。這樣較高的投資率很難維持。三是國內市場中城鄉居民消費。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上最大的隱憂就是城鄉居民內需相對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報酬佔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 年佔 53.4%，2005 年下降到 41.4%，15 年間，下降 12%；近幾年還在下降。但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報酬都要佔 GDP 的 60% 以上。在我國大陸居民所擁有的金融產品中，20% 的富人佔有 66%，而 20% 的低收入者只佔有 1.3%。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城鄉居民的購買力是基礎。這些年來，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各項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裡有點錢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著八億人口的農村收入明顯增長乏力。2009 年上半年國內個人消費僅佔 GDP 的 15.5%。現在全國有四萬億左右的庫存積壓。2009 年粗鋼產量可能要超過七億噸，但市場需求僅為五億噸左右。供過於求的商品佔全部調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要達到 70~8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是消費最終決定生產，決定 GDP。東西賣不出去，誰還敢投資？投資得少，較高的 GDP 的增長率就很難較長久的維持。

第六是勞動力資源。改革開放 30 年來，沿海發達地區絕大多數農民工工資基本上維持在 800~1000 元左右。豐裕廉價的勞動力支撐了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但我國目前未富卻已進入準老齡社會。到 2015 年生產年齡（15~64 歲）人員將明顯減少。等到“80 後”、“90 後”進入生產年齡，有的可能要兩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四個老人。此時，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按

照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屆時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將明顯下降。

第七是外資資源。由於以上六個資源充裕，加上我國各項政策到位，外資進入我國後其利益能夠得到保證，中國吸引外資水平繼續提昇，連續 17 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我國外資企業的出口與進口均佔全國總量的 50% 以上。外資帶來了經濟繁榮，使得中國 GDP 迅速增加。目前，外資進入我國仍會保持一定的額度（僅 2009 年 4~6 月，國外“異常資金”進來共有 880 億美元），主要一是看準人民幣在最近幾年內是昇值的趨勢，這些“異常資金”進來是爲了賺取人民幣昇值的匯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們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圖賺取暴利；三是收購我們的關鍵行業的國有和民營企業，再包裝上市賺錢或直接“做黃”以實現其對我國內消費市場的壟斷；四是想佔領我們的服務行業，特別是金融、保險、文化產業等領域。但是，我們應注意外資進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如果 3~5 年、十年八年之後，上述六個資源都有明顯萎縮或受到限制，賺錢難度加大，外資這第七個資源也就可能逐漸乃至大量減少。因此，在近些年內，我們要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在特定的條件下外資大規模撤離時，給我們帶來的極大的金融及社會等風險。

以上七個資源帶動了房地產、高速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工業和外貿出口四個產業的高速增長，由此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電力、建材等 30 多個行業的超常規發展。由於以上七個資源的限制，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四個產業正在變爲“夕陽產業”。我們亟需尋求和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產業。我們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僅從技術經濟學、經濟運營學的角度考慮問題；預測經濟、規劃發展也不能僅僅只是關心

今年、明年、後年，而應是五年、十年甚至 20 年，應該有中長期的戰略考慮，從 2020 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上去考慮。

如何解決未來一些年內以上七個戰略性資源可能相對萎縮的問題呢？我個人認為，必須在“十二五”規劃中，高度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新型國家。據 2005 年國家統計局經濟普查數據第二號公報中披露，我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佔銷售收入的 0.61%，即使是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 1.7%。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8.6% 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我國科研投入佔 GDP 的比重僅有 1.3%，而以色列為 4.9%，瑞典是 4%，芬蘭達到 3.9%。以我國企業生產的耐克鞋為例，價格為 200 美元，外國設計者可得到 100 美元，品牌商可得 90 美元，我們的企業所得僅是十美元，工人工資則更是低微。我國生產一臺 DVD 交給外國的專利費是 18 美元，企業只賺一美元。我國生產的一些產品往往只有 2~3% 的利潤。中國的崛起不能僅靠“汗水工業”、環境污染和資源的過度消耗。因此，在制定“十二五”規劃中，要高度重視把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貫穿其中，切實加大對教育、科研和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開發等支持力度。對核心技術我們決不排除並要大力引進，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創；在核心技術這一關鍵性問題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與前些年有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並不缺乏外匯儲備。現在利用外資時，一定要“擡高門檻”，高度重視對新技術等的引進。

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就必須從統籌全國的分配入手，讓最

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明顯增加。從中長期來說，我們要確保小康社會的實現，就必須培育消費市場。培育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還在增大，而不是縮小。從中長期看，這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影響社會穩定。分配屬於生產關係的範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是，我們也應記住第二句話，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分配搞不好，最終要制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研究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不僅要從生產力的角度，同時更要注重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研究和指導。要注重用黨的基本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的經濟工作。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數次提到分配問題。1992年12月18日，鄧小平同志說：“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² 如何理解“內仗”？很值得我們深思。1993年9月16日，他與弟弟鄧墾談話時又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³ 江澤民同志也多次強調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早在1996年他就明確指出：“理順分配關係，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目前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直接關係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關係企業發展的後勁，關係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把解決分配領域的問題提到重要日程。”⁴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有很長一段專門講了解決分配問題並指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並進一步加強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以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

²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1356~1357 頁。

³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第 1364 頁。

⁴ 《江澤民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57 頁。

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係”。⁵ 前不久召開的 2009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又明確指出“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加大國民分配調整力度”。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解決分配問題，有著十分深刻的意義所在。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具體工作部署中扎扎實實、有效地解決分配問題。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還會影響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當然，我們也不能一下子把人們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義的老路。但現在的主要傾向並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問題。我們應該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而應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當今時代的特點和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出發，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這個根本利益應該是個人和集體、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長遠利益的有機統一）。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從統籌中國整個的、根本長遠的發展的高度，來調整我們目前的分配政策。

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孔”。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孔”，就牽住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可能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⁵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第 315 頁。